

---

# DIALOGUE IN ACTION: CHINA AND THE RED CROSS MOVEMENT

## 行动中的对话： 中国和红十字运动

---

RODERICK O'BRIEN

我是澳大利亚红十字会的一名普通会员。我在该协会不担任任何职务。这里所表达的观点只代表我自己，并不涉及任何组织或个人的观点。

### 摘要

这篇文章通过对中国近代史上四个时期的红十字运动历史的考察，探讨了与中国对话的前景。作者采用了习近平提出的四项对话主张，然后根据红十字会的历史，提出了另外两项主张，以便在对话过程中遇到挑战和困难时提供帮助。这篇关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简述表明了耐心和互惠对于维持任何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

## 构建对话框架

2019年5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会议上发表讲话，并提出了对话的四个主张。

-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
-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习近平，2019年）

这些对话的要素非常有用，但在我看来，我们还可以有效地增加两个要素。

- 第五，允许对话影响和改变自己的立场。
- 第六，发展对话失败时的机制。

红十字运动，作为一种理想，始于1859年血腥的索尔费里诺战役。军队未能照顾到他们的伤员，这让瑞士银行家亨利-杜南感到震惊。杜南写了一本强有力的书《索尔费里诺的记忆》，其中建议组织自愿者协会，不分国籍地帮助伤员，并达成一项保护志愿者的国际协议。（杜南，1986年）这本书启动了一个人道主义项目，后来在各种红十字会结构中被制度化。

自1859年以来，该运动不断发展，采取了各种形式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由瑞士将军纪尧姆-亨利-杜富尔（Guillaume Henri Dufour）领导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在1864年签署了第一个《日内瓦公约》。（O'Brien, 2017）多年来，红十字会制定了一套原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应对措施。这包括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军队广泛宣传国际人道法（IHL）。各大学也参与了国际人道法的宣传工作，一些大学设有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

对话的第五点至关重要，我们要避免出现对话只是关于自己立场的独白。当没有改变的可能性时，我们可以把这些独白称为“聋子的对话”。对话的第六点也很关键，因为对话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误解、误译、误入歧途都可能发生，即使是在有善意的情况下。

对话伙伴：红十字运动

我选择将对话中的一个伙伴描述为红十字运动。这是为了避免将对话与红十字运动中的某些机构联系得太紧密。我想说的是一个运动的进展，作为一种理想，它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不想评论各种机构，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许多以红十字为名的国家协会，包括目前的中国红十字会。

概括为公正、中立、独立、志愿服务、团结和普遍性。（ICRC, 2016）

对话伙伴：中国

《澳门利氏学社学报》（MRIJ）的读者不需要对中国进行介绍！但注意到一个细节也许是好的。这种对话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非常不同的时期。清华大学的博士后魏冰凌博士为这种对话提出了一个四部分的划分。帝国晚期的中国，民国时期的中国，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以及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Wei, 2020）

在帝国政权的最后几年，公共援助的传统方法是通过地方乡绅。但有几个因素结合起来，使红十字运动的信息具有吸引力。一个因素是有很多中国人在欧洲或日本遇到过红十字会的活动。（Li, 2016）。另一个因

素是外国人的存在，包括商人和传教士，他们有红十字会的经验。第三是日本红十字会在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和日俄战争（1904-1905）期间的运作，当时红十字会人员治疗双方的伤员。（Wei, 2020, 94）在甲午战争期间，外国医务人员和传教士，有时与当地入一起，建立非正式的红十字医院，这表明该运动的原则，尽管不是组织结构，已经在中国得到了一些认可。对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提出了四个不同的日期，这表明该运动的原则的传播，无论如何理解，都在正式成立之前。

对话的代理人：沈敦和

我无法找出对在中国建立运动的每一个贡献者，这已超出了本报告的范围。但是，一片森林是由许多单独的树木组成的。因此，我想指出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作为对话的例子。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沈敦和。最近，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孙硕鹏这样评价沈敦和。

“毫无疑问，第一个令人难忘的人是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沈敦和。从他的照片来看，他看起来像一个老人。事实上，他只活了55年。他是剑桥大学的归国留学生，在第一次中日战争期间，他是负责特务派遣的官员，是国际法专家，也是外交部长。沈敦和有这么多头衔，他的一生经历了这么多沧桑，似乎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1904年，他创建世界红十字会上海分会时只有39岁。当时，他正处于人生的鼎盛时期；然而，他的国家正处于崩溃的状态”。（Sun, 2012）

与中国对话的一些关键人物是那些在国外学习并参与了他们带回中国的思想和运动的中国人。沈敦和就是其中之一。沈敦和和其他

人在上海成立了世界红十字会，也许是因为有许多外国公民参与而得名。它后来变成了大清红十字会，后来又变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沈敦和因建立医院而闻名，包括流行病医院。（Peng, 2022）

2017年，一个纪念耶稣会传教士饶家驹的牌匾在上海竖起。（ Yi, 2017 ）1937年，饶家驹在救济工作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他带领一群人建立了一个“安全区”，在上海的郊区战斗中至少庇护了30万中国平民。饶家驹领导了与中国和日本当局的谈判，建立了南市难民区。它位于上海老城区，毗邻法租界。该区受到交战各方的尊重，并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多样性的一个有趣方面是，饶家驹的助手潘达是上海的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Anon, 2015）

饶家驹是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其难民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成员在工作中佩戴着红十字会徽章。“安全区”的边界由红十字会的旗帜标识。（Ristaino, 2008）尽管安全区的问题可能在1934年东京举行的第十五届红十字国际会议上被讨论过，但并没有直接的条约法来保护平民。只是饶家驹和他的同事们的倡议才如此有效。饶家驹没有受到条约法问题的限制，而是以红十字运动的原则为动力。这个安全区是中国其他安全区的典范。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是根据与上海安全区委员会相同的原则建立的，共收容了约25万名平民。

沈敦和和饶家驹这两位对话者，可以作为将运动精神带到中国的代表。他们在中国发现，人道主义精神与儒家传统中的仁道精神形成了一种便捷的联系。（Li, 2022）

## 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国际人道主义法律

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与国际人道法（IHL）之间的联系。亨利-杜南最初的提议有两个要素：在和平时期组建可以援助战争伤员的志愿者团体，以及达成一项保护伤员和志愿者免受攻击的国际协议。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第二个要素，即国际协议，为现代国际人道主义法律提供了基础。参与这些条约始于清朝，在1904年和1906年。此后继续由中华民国加入1929年的公约，并进一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加入了1949年创立的公约和附加议定书。（Wang, 2013）

## 创新的机会：苏州大学红十字 与红新月国际学院，苏州

2019年，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与江苏的苏州大学达成协议，主办一所学院。几年前，红十字与红新月联合会就建立了索尔费里诺学院，但在苏州的学院似乎是与当地大学合作的第一所。万立骏在学院成立仪式上发言，为对话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贡献。他说：“红十字会精神教育的开展应与道德和教育的基本任务结合起来。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红十字精神教育结合起来”。（Anon, 2019）这可以为涉及红十字运动原则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原则的对话提供一个创新机会。

在中国方面，一直在不断学习红十字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保护战争受害者和相关的保健活动。中国早期关于在和平时期维持红十字活动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观点相结合，改变了红十字活动的重点，使其包括和平时期的救济工作。

自那时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一直是该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并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国的应对措施。这包括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军队广泛宣传国际人道法（IHL）。各大学也参与了国际人道法的宣传工作，一些大学设有国际人道法研究中心。中国国家国际人道主义法委员会是一个部级机构，成立于2007年，旨在更好地协调和促进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内实施。（Zhang, 2017）

这种参与是双向的。中国法官在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国际刑事法庭任职。中国人已经成为圣雷莫国际人道主义法研究所等全球机构的教师（何晓东大校在该研究所工作多年）。中国学者和非中国学者一直在探索中国古代和当代哲学与红十字运动精神之间的相似之处。

## 评估对话

我将遵循我在开始时给出的指导意见。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平等的基础上对待两个不同的实体是很难的。一方面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是一个运动，两者不能等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对该运动及其目标的尊重有所增强，并寻求参与由该运动发展起来的结构和活动。我希望对话能够继续下去。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一点。人道主义精神和仁爱之心是人类生活的美丽层面。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在中国方面，一直在不断学习红十字运动的工作，特别是在和平时期保护战争受害者和相关的保健活动。中国早期关于在和平时期维

持红十字活动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观点相结合，改变了红十字活动的重点，使其包括和平时期的救济工作。中国开始向外拓展：第一步是在1923年，在1923年日本地震期间，当时的会长纽博士带领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去援助日本。这是中国的第一次海外医疗援助。(Qiao, 2020)

然而，红十字运动的两个关键原则是独立和自愿服务。在每个阶段——帝国时期、民国时期、毛泽东时期和后毛泽东时期——都有来自国家领导人的压力，要求红十字会依附于政府，或者至少是严格控制。有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就像一个政府部门。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与红十字运动的对话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工程中的一项内容，这项工程正在进行。对话的载体是中国自己的人民，以及来自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外国人。这个故事包括红十字会医院、流行病和大流行病的保护以及国际法。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学院是最近的一项创新，已经在中国为年轻人开设课程。

第五，允许对话影响和改变自己的立场。红十字运动的学习包含某些对中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敏感的话题。此外，红十字会还着手发现中国文化中可以与红十字运动产生共鸣的因素。对中国来说，这些变化包括法律制度的变化，纳入培训方法，如法律学生的模拟法庭，以及采用西方的医疗和护理做法。

第六，建立对话失败时的机制。当对话的一方是民族国家，而另一方是民间社会中涉及机构参与者的分散运动时，这很难具体说明。但有一些事例：一个是红十字运动在中国的生存，与之形成对比的是1949年后被当局禁止的地方红十字运动。(Pfeiff, 2016)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困难时期，对话也一直保持着，当时中国红十字会的分支结构崩溃了，该组织几乎消失了。(魏，2020)恢复对话的成功机制可能包括耐心，以及对任何一方底线的清晰认知。

## 结论

根据对一个多世纪以来这种对话的回顾，一个结论是，对话的参与者必须准备好从长计议，接受暂时的挫折或延误。耐心是一种关键的美德，特别是当与尊重相结合时。

我们对红十字运动和中国之间的对话进行了简要概述，使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为体。而且，在我们观察的这段时间里，中国和红十字会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对话仍在继续，毫无疑问，未来仍会有变化。中国和红十字运动都可以为对方做出很多贡献。



RODERICK O'BRIE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 REFERENCES 参考资料

- Anon, (2015). “Shanghai remembers French Savior of 300,000 Refugees,” *Xinhua* (16 August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937309.shtml>)
- Anon, (2019).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Red Cross & Red Crescent Established in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Retrieved from <http://eng.suda.edu.cn/eng/News/SoochowNews/201909/7ee749aa-3b3b-4cd5-bd2c-64a520c47c4a.html>)
- Dunant, H. (1986). *A Memory of Solferino*,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rc.org/en/doc/assets/files/publications/icrc-002-0361.pdf>)
- ICRC, (201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Red Cross and Red Crescent Movemen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fundamental-principles-red-cross-and-red-crescent>)
- Li, Q. (2022). “Sublime Words with Profound Meaning: Pre-Qin Scholars’ Comments on Military Affairs and Their Convergences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Retrieved from <https://blogs.icrc.org/religion-humanitarianprinciples/wp-content/uploads/sites/114/2022/06/Pre-Qin-Comments-on-Military-Affairs-and-Their-Convergences-with-IHL.pdf>)
- Li, Y. (2016). “Red Cross Society in Imperial China, 1904-1912: A Historical Analy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7 (5), 2274-2291.
- O’Brien, R. (2016). “Military Ethics and Responsible Leadership: the Enduring Contribution of Guillaume-Henri Dufour,” Sunil Savur and Sukhbir Sandhu (eds), *Responsible Leadership and Ethical Decision-Making*, 2016. (37-48), doi 10.1108/S1529-209620170000017006. Bingley, UK: Emerald.
- Peng, S. (2022). “Social Network: How Shanghai Stemmed the Surge 100 Years Ago,” *Sixth Ton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0646/social-network-how-shanghai-stemmed-the-surge%2C-100-years-ago>)
- Pfeiff, A. (2016). “The Red Swastika Society’s humanitarian work: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Red Cross in China,” *New Global Studies*, 2016, 10 (3) 373-392.
- Qiao, Z. (2020). “East-meets-West hospital ‘golden brand’ for Red Cross Society spirit”, *Shine (Shanghai Daily)*, (22 August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hine.cn/feature/art-culture/2008224471/>)
- Ristaino, M. (2008). *The Jacquinet Safe Zone: Wartime Refugees in Shanghai*,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 S. (2012). “Salute the Founding Fathers and Forerunners.” China Red Cross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en.crcf.org.cn/sys/html/lm\\_13/2013-11-13/141346.htm](https://en.crcf.org.cn/sys/html/lm_13/2013-11-13/141346.htm).)
- Wang, W. (2013). “The PLA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Stockholm: Institute fo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isdsp.eu/content/uploads/publications/2013-wang-pla-international-humanitarian-law.pdf>.)
- Wei, B. (2020). *Problematising the Public Spher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China*,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Adelaide, (Retrieved from: [https://digital.library.adelaide.edu.au/dspace/bitstream/2440/123505/1/Wei2019\\_PhD.pdf](https://digital.library.adelaide.edu.au/dspace/bitstream/2440/123505/1/Wei2019_PhD.pdf).)
- Xi, J. (2019).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Xi Jinping attended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onference on Dialogue of Asian Civilizations and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Xinhua*, 15 May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xitheory.china.com.cn/2019-05/15/content\\_74802270.html](http://xitheory.china.com.cn/2019-05/15/content_74802270.html))
- Yi, X. (2017). “Priest Honoured for Saving Thousands from Invaders” *China Daily* (15 December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712/15/WS5a330236a3108bc8c6734c20.html>.)
- Zhang, M. (2017). “China: a conference to mark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the Protocols Additional to the Geneva Conventions” ICRC (19 May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china-40-anniversary-additional-protocols-geneva-conventions#:~:text=China%20is%20a%20State%20Party,implementation%2C%20and%20development%20of%20IHL.>)